

中国铜元谱

段洪刚 编



中国钱币丛书乙种本之四

中華書局

中国钱币丛书乙种本之四

中国铜元谱

段洪刚 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铜元谱/段洪刚编. —北京:中华书局,2007.3
(中国钱币丛书.乙种本;4)

ISBN 978 - 7 - 101 - 05493 - 4

I. 中… II. 段… III. 铜币(考古)—中国—图谱
IV. K875.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0808 号

-
- | | |
|--------------|---|
| 书 名 | 中国铜元谱 |
| 丛 书 名 | 中国钱币丛书乙种本之四 |
| 编 者 | 段洪刚 |
| 责任编辑 | 郑仁甲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人民美术印刷厂 |
| 版 次 |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14½ 字数 400 千字 |
| 印 数 | 1 - 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5493 - 4 |
| 定 价 | 86.00 元 |
-

《中国钱币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戴志强

主 编：黄锡全 姚朔民

副主编：顾 青 金德平

编 委：（按姓氏笔划）

王永生 王贵忱 叶世昌 华觉明

汪圣铎 吴荣曾 郑仁甲 周卫荣

金德平 姚朔民 顾 青 高聪明

黄锡全 裘锡圭 戴志强

《中国钱币丛书》编辑缘起

近年来,随着我国钱币收藏、研究活动的日趋繁荣活跃,广大读者对钱币学著作的需要也日益提高。读者既需要高水平的研究著作,也需要深入浅出的普及性读物。为了适应这种形势,中国钱币学会准备编辑一套反映当代钱币学水平的《中国钱币丛书》,中华书局也拟出版面向广大读者的《钱币丛书》。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协议合作,并邀请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共同编辑出版《中国钱币丛书》,以飨读者。

《中国钱币丛书》分甲种本和乙种本两种:甲种本为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力争反映当代钱币学的研究成果。乙种本为高质量的普通性读物,力争融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中国钱币丛书》的编辑,尚无经验,在构思选题以及其他方面,必然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我们诚恳地期望泉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合作与支持,以便能把它办得更好,更能反映当代的学术水平,更能适合广大读者的需要。

《中国钱币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年4月

序 一

黄锡全

《中国钱币丛书》从1993年创办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3个春秋。出版的著作分甲、乙两种,已经出版24部:

甲种本21部,按出版编序分别是:

蒋若是著《秦汉钱币研究》,甲种本之一,1997年。

杜坚毅 顾佩玉编著《新疆红钱大全图说》,甲种本之二,1996年。

[日]小川浩著 车新亭译《新订北宋符合泉志》,甲种本之三,1996年。

戴建斌著《中国钱票》,甲种本之四,2001年。

齐宗佑编著《咸丰钱的版式系列——自藏自拓咸丰钱集》,甲种本之五,2002年。

王雪农 刘建民著《中国山西民间票帖》,甲种本之六,2001年。

石长有编《民国地方钱票图录》,甲种本之七,2002年。

阎福善、高峰英、袁林、周延龄编著《两宋铁钱》,甲种本之八,2000年。

黄锡全著《先秦货币研究》,甲种本之九,2001年。

福建省钱币学会编著《福建货币史略》,甲种本之十,2001年。

周卫荣 戴志强等著《钱币学与冶铸史论丛》,甲种本之十一,2002年。

王雪农 刘建民著《半两钱研究与发现》,甲种本之十二,2005年。

周卫荣著《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甲种本之十三,2004年。

汪圣铎编《两宋货币史料汇编》,甲种本之十四,2004年。

[英] Joe Cribb. Barrie. Cook. Lan Carradice 著, 刘森译, 王永彬校译《世界各国铸币史》, 甲种本之十五, 2005 年。

何逞锋主编《永隆通宝钱范》, 甲种本之十六(误印“十五”), 2005 年。

戴志强著《戴志强钱币学文集》, 甲种本之十七, 2006 年。

沈鸣镝编著《中国近代机制币》, 甲种本之十八, 2005 年。

段洪刚著《中国铜元分类研究》, 甲种本之十九, 2006 年。

石长有编《清代地方私帖图录》, 甲种本之二十, 2006 年。

佟昱著《顺治通宝钱谱》, 甲种本之二十一, 2007 年。

乙种本三部, 分别是:

陈达农著《古钱学入门》, 乙种本之一, 2001 年(2006 年重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钱币协会编《世界现行硬币图册》, 乙种本之二, 2003 年(2006 年重印)。

侯士敏编著《金泉沙龙——历代名家货币思想述论》, 乙种本之三, 2005 年。

编集出版丛书的初衷, “甲种本为高水平的研究著作, 力争反映当代钱币学的研究成果。乙种本为高质量的普及性读物, 力争融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 深入浅出, 雅俗共赏”。尽管已经出版的这些著作水平参差不齐, 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或不足, 但大家始终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 基本上达到或接近有关要求。这些著作不仅汇集了很多新的资料, 总结出了很多规律, 而且贡献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需求, 赢得了大家的肯定。这除了作者个人的努力外, 还与编委会和编辑的辛勤劳动密不可分, 也与有关专家学者的审阅把关密不可分。在此, 我们要感谢作者及为此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乙种本目前仅仅出版三册, 与甲种本比较显然少了许多。其中的原因, 除了选题不好把握以外, 我推测是乙种本比甲种本还要难写的缘故。从普及的角度看, 社会上需求较多者应该是乙种本。因此, 我在此呼吁, 希望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 能够写出一些高水平的符合大

众口味的作品。只要达到要求,我们会尽力促成出版。我认为,钱币学家只有把钱币知识变成大众都能享受并从中受到教育与启迪的作品,才算真正尽到了责任。

段洪刚所著《中国铜元分类研究》上下两册,2006年1月作为中国钱币丛书甲种本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上册为文字说明,下册为图版。此书的推出,在学术界和收藏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他的多方努力,资料收录较全,比较实用,受到读者的欢迎。令人感动的是,为了收藏或收集资料,他不仅花费了很多心血,而且占用了许多资金。据说他为了能够回收部分成本,硬是在网上一本一本地销售。个人包销的几百册著作,其艰辛可想而知。

由于《中国铜元分类研究》两大册对于一般需要了解铜元知识的读者来说代价太高,携带不便,于是有不少读者希望他能够续编简本。这本《中国铜元谱》就是应读者的需求而编。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刚拿出的稿件,除了图片及介绍图片的文字说明外,没有总体叙说的前言,中间各部分的文字概括也不多,前后顺序需要调整。我们在肯定他的辛勤劳动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向他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要求,希望该书不仅要有版别的介绍,还要有概括性的总结。他虚心接受了这些建议,并很快草拟了前言及调整、修改了有关部分。我请姚朔民、金德平二位先生认真审阅,帮助把关,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他对每一条意见都认真对待,反复斟酌,几乎又重写了一遍。经过几次反复,遂使文稿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错误,提高了质量。我想,我们编辑丛书就是要坚持对读者负责的精神,作者要能够虚心听取他人不同的意见,不断加工,保证质量,切忌急于求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才会有市场,才能真正为繁荣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这不算什么序言,只是借此机会就钱币丛书的编辑出版说几句话,同时祝贺段洪刚在铜元研究方面又一成果的出版面世。相信此书的出版,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2007年1月18日于北京无为斋

序 二

郑仁杰

中国铜元铸造时间前后仅半个世纪,它的出现改变了中国 3 000 年来的铸钱模式,在中国钱币史上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铜元与金币、银圆同属近代机器铸币,但它的数量和版式种类从清朝的龙图到民国的双旗图,远比金币和银圆复杂精彩得多。

铜元在当时作为小额零钱,日常消费中使用很多,所以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当时人们不重视流通货币,所以早期研究者多为外国人,其中以伍德华的研究成果和贡献最大。他从民国 15 年至 24 年陆续发表了英文文章,后集结出版《中国铸造的十文铜币》一书,将铜元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来研究,以科学的方法将铜元复杂的种类,作有系统的分类,并将正反面编号配上搭配表,为日后铜元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只可惜伍德华只针对十文的部分,整体性难免不足。

60 年代日本秋友晃先生在日本成立“中华铜币研究会”,并发表“光绪元宝”“大清铜币”“民国铜元”等书,基本补足伍德华十文以外的部分,将铜元研究推上另一尖峰,惜该系列作品未公开出版。伍德华与秋友晃以外国人的身份,对中国铜元投入无比的热情,他们的研究精神令人佩服。

1989 年江苏省钱币学会编印“中国铜元资料选编”一书,该书可说是由国人出的第一本铜元资料专书,之后由沈阳张培林主编的《中国机制铜币》及华光普编辑的《中国铜元目录》相继出版发行,都对推进铜元的收藏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由于这些书图片使用了黑白拓片,收录品种不够全面,且印刷模糊不清,使铜元局部无法辨识,许多

版别种类没有受到重视。有鉴于此,笔者于1997年在台湾出版《中国铜元鉴赏》一书,成为当时中国第一本彩色印刷的铜元书,希望以清楚的实物图片让人更多了解铜元的美,更广泛地传播铜元收藏的知识,到今年恰好10年。回顾这10年之间,中国钱币的收藏研究热潮逐年加温,而且最近的各种钱币书籍也多以彩色照相出版,一改过去黑白墨拓及模糊的印刷,让钱币不再屈居文物末流。

21世纪已进入网络时代,收藏和研究铜元变得更加方便,也使在各地的藏家能通过网络进行实时的讨论,交流更多信息,发掘更多稀少版别,研究成果倍增。本书作者段洪刚先生在网络上不辞辛苦,努力经营维护铜元论坛,并提携后进,使铜元收藏达到空前的盛况,并于2004年9月参与促成第一届中国铜元研讨会在江苏扬州举行。与此同时,作者全力加大编纂《中国铜元分类研究》一书的力度,要将这些庞大的铜元文献数据和图片与前人的研究成果集结起来,非常不容易。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作者深知自己的使命与广大泉友的期盼,倾注全力,废寝忘食,终于在2006年1月将该书出版(该书于2000年开始撰写),内容涵盖中国各个地方、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面值的铜元,堪称一本铜元百科全书,满足了欲深入研究者的需要。

但该书也由于庞大的文字和图片,而稍嫌繁重,而且携带不便(上下册16开本140多万字,重达4斤半),使部分初学者望而却步。这样对于铜元收藏和研究的延续也有所影响,促使作者意识到要为读者另编一本简明易懂、携带方便的参考书,这同时也是广大钱币爱好者的共同心愿,《中国铜元谱》因此产生。

作者以全新的编排方式,深入浅出的介绍,并以彩色图片搭配文字说明,每一枚钱币均以实物原大列出,单独介绍的部分均有直径、厚度、重量、评级、标价等项参数。其中标价部分更有了突破,分为上品及原光品两种。因为铜元流传至今,还保有原铜光的并不多,有些省份更是少见,所以市场成交价常超过上品的好几倍甚至数十倍,这个差异在全国各地市场均有明显表现。此书也应了市场的需要,真实地反应原光品的大致市场价格,这也算是与国际接轨的一个表现吧,国外

钱币收藏界对机制币品相的重视与保护品相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十文和部分二十文面背版式搭配表的运用,是对70年前伍谱编码体系的补充与发展。篇幅省了,内容却更丰富了,为将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方法。

《中国铜元谱》是作者在《中国铜元分类研究》之后克服困难,吸取最新研究成果与收藏实践经验的另一部著作。从具体品种的解说与安排来看,作者更成熟了,作品中体现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更完善与可信,这也说明作者在这大半年,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积极学习,总结经验教训并取得了新的成果之。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发行,会使科学的铜元研究和铜元收藏知识更快速普及,铜元事业,包括本书作者未来的发展,将是不可限量的。故乐为之序。

2006年11月

铜元历史概说

(代前言)

铜元的本质属性,乃是一种贬值的虚值大钱,发行早期与银圆一起介于主币辅币不分的地位,流通中期的衰落是因为它由应急的小额硬币成为开辟财源的途径,从而无限制滥铸,造成贬值,失去信用。1933年后的衰落则主要由于民国政府法币政策的实施以及日寇的侵略,造成铜的价值高昂,铜元名实不符,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铜元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因为它既不再行使市场交易职能,新中国人民政权也不需要拿它来作为生财之道。我们今天收藏、研究铜元,完全是站在历史的角度与收藏文化的角度,但我们也要充分了解铜元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以便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研究与收藏。

一、铜元产生的背景

铜元又叫铜板、铜毫(云南民间称呼)、铜角子(华中及北方部分地区称呼),尺寸大小不等,随面值变化,是用紫铜或黄铜铸造的圆形硬币,有少量白铜样币存世,是中国近代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国经济、金融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铜元上接清朝晚期的方孔制钱,但中间基本无孔,完全用现代机器冲压而成,在外形与图案设计上受到19世纪中后期英国殖民者在香港发行的“香港一仙”的影响。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铜币铸造工艺从传统的翻砂熔铸法进入了先进的机器冲压生产的新阶段。

中国内地铜元产生于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即庚子年。一般即以这一年为中国铜元的诞生年,虽然香港地区制造铜元开始于

1863年,但早期香港铜元是以英王国为主体发行的香港地区辅币,不属于晚清铜元体系范围。

铜元的起因有内外两个方面。在1900年以前的清朝,中国一直是方孔圆形铜钱和银两的混合本位制。明朝后期开始,相当数量的外国银币陆续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流通,清朝中叶以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而且在银两与银圆换算上造成许多出入和变化,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银荒与币制紊乱。早在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期间(道光十三年前后),即有外国银圆优良、应自行设计铸造的奏折,可惜时局艰危,内忧外患,而且银两制钱制度根深蒂固,统治者不到穷途末路不会加以改革,因此林则徐的先进主张未能得到统治者的重视^①。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内白银外流加剧,外国银圆更普遍地进入中国流通,更让中国民生艰难。1851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全面地冲击了落后的制钱制度。咸丰皇帝为筹措镇压革命军的军费而下令全国各地大量铸造大钱的举动,等于宣告了制钱制度的末日。扑灭太平天国之后,1枚当十大钱跌落到仅值二文的地步,清政府面对着立国以来最大范围的通货膨胀与外币侵袭的局面。这些现象终于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重视。

19世纪80年代,天津、江南、湖广等地曾经在洋务派的工厂里有计划地铸造过机器制钱(其中江南宝宁局在国内外试铸过大量样币,流通版也有相当数量,但最多见的还是宝广、宝武等局),以现代机器铸造方孔制钱,企图挽回江河日下的制钱制度,但铸造成本依然高过面值,每个铸造厂都面临严重亏损的局面。这一事实证明,制钱制度已不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已脱离了人民大众的需求现实。

如何既能保持“祖宗成法”,又能使制钱制度脱胎换骨、适应新形势下中外货币交易交换的迫切需求,而且还能产生铸币利润?铜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出现的。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最迫切的还不是铜元这种小额钱币的需求,

^① 1981年《文物》杂志第10期。

而是银两、银币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如何挽救银两,铸造自己的银圆,成了洋务派与革新派考虑的头等大事。

三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李鸿章、李瀚章为机器制造银圆、铜元做了许多工作。1887年,光绪十三年,张之洞主持在广州开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机器造币厂,全套购进英国伯明翰-喜敦父子公司的设备,并聘请英国技师主持建设、管理、模具雕刻等。当时的造币厂还代表总督李瀚章写信并赠送金质纪念章给英国伯明翰造币厂的喜敦父子,称“我们总督通过怀恩先生向您赠送一枚金质纪念章,作为你们杰出工作的纪念”。该信赞扬该厂的机器非常出色,并在纪念章上刻有“技擅华洋”4个字^①。该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先进造币厂,于1889年开始铸造银圆,有一圆、半圆、二角、一角、五分5类,成效显著,很快流通全国,成为机制银币的范本。此后全国大部分省份都纷纷上马开办造币厂制造银圆。银圆的成功为铜元的产生准备了经验,培养了人才,奠定了基础。

铜元产生的外部直接因素,主要是自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势力范围”和抢占“租借地”的狂潮。一些外国银行、金融机构争先恐后涌入中国,在沿海“开放”城市开设各种银行,发行货币,推销银圆等金融品种,掠夺中国生银。进一步使中国旧有的、已经残喘的制钱、银两制度陷入泥潭。各省开铸的银币缓解了流通市场的压力,但小额钱币市场依然严峻,很多地方已经到了市面无钱可找、纠纷迭起、商业阻滞的地步。

随着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全面深入,不单是沿海“开放”城市,整个中国对外贸易一再入超,大量白银外流,加上沉重的战争赔款,清政府的财政恐慌日益严重。与此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源的掠夺性投资,客观上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样一来,全社会对货币尤其是对小额钱币的需求量日益增大。此外,铜元用机器铸造,效率大为提高,这也是其能产生的一大原因。铜元,就在这内外交困、上下需求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诞生了。

^① 该信及相关内容见附图及《中国钱币》1988年第3期。

二、晚清铜元的铸造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与赔款,对维新知识分子的刺激是非常巨大的。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在1896年奏请整顿京师同文馆学制,并参与制定具体课程,剔除了四书五经,可谓敢为天下先。次年,自强激情一发不可收拾的陈其璋又奏请仿造大小铜元,补救钱荒,填补全国普遍停铸制钱后的市面空虚。其奏折充满激情地描述了制钱之坏与铜元铸造的种种好处^①:

窃维圜法之坏,至今已极。……若不设法补救,恐生计日蹙,民不聊生,难保不激成变故。臣一再筹思,计唯仿照外洋添造大小铜圆,以补制钱之不足。……若以机器改造铜圆,则其利何可胜算:需铜少而值钱多,其利一;成式定而抵值准,其利二;分作三品,市廛适用,其利三;不穿中孔,工省价廉,其利四;铜色精莹,人知宝贵,其利五;往来商贾便于携带,其利六;鼓铸愈多则银价自长,其利七;行用既广而物价亦平,其利八。然此仅言利之说也。以言乎弊,则不禁自绝者四:花纹精工,伪造难以摹仿,一也;铢两分等,私铸不能混射,二也;值钱既多,毁熔无可图利,三也;抵值既准,兑换无可低昂,四也。

奏折中提到的“分作三品,市廛适用,其利三”指的是参考外洋铜元,“查外洋铜圆分为三品:上品重四钱,中品半之,下品又半之。三品均用红铜,每百斤价银二十两;若以白铅搭配,则为黄铜,每百斤价仅十三两五钱,而上品大铜圆可铸四千枚……成本既少,获利自多”^②。

陈其璋对铜元利弊的陈述,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准许他的建议,准备下令沿海省份试铸。但来自守旧派的反对意见依然强大,特别是上一年因陈其璋在制定京师同文馆8年学制中废除四书五经的举措,引起了朝中诸多清流重臣的非议,统

^①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652页。中华书局,1964年。

^② 同^①,651页。

治者也有所不满,因而此时提出恢复铸制制钱以反对制造新式铜元的呼声甚嚣尘上。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反对派很快占据了上风,以至陈其璋铸造铜元的奏请最终未能实行。

同时江南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厂又开始试铸了一批机制方孔制钱出来,看起来似乎制钱尚有希望。这一耽搁,又是3年过去了。这期间章京刘庆汾分别于1898年、1899年两次奏请开铸新式铜元,并详细列举了日本等国的铜元成绩,但均遭到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反对派的驳斥或冷遇。

然而江南、天津等地铸造的制钱,虽然改进了部分设计,更新了部分机器、铜料配比等,但铸造量有限,市面钱荒未见丝毫改变,同时铸币厂又亏赔严重,清政府才最终决定开铸铜元。这时守旧派在严峻现实的教训下也不敢再强硬反对了。何况这个时候,掌握朝中大权的是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广东钱荒最紧张的1900年,广东钱局与广东善后局联名呈请巡抚德寿和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允许铸造铜元,仿制香港“铜仙”,以抵制外洋铜元,救济财政。李鸿章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请求。

1900年6月,广东造币厂第一次铸造出了最早的铜元,每枚重2钱(7.45克),以紫铜95%、白铅4%、点锡1%配合铸成。直径28毫米,形式精美。正面中央铸“光绪元宝”4个汉字及满文“宝广”,外环珠圈,上缘纪地“广东省造”,下缘纪值“每百枚换一圆”,左右边饰小花星;背面中央铸有象征清朝皇帝的飞龙图案,龙图外环珠圈,上缘英文纪地“KWANG - TUNG”(广东),下缘英文纪值“ONE CENT”(一仙),左右边饰小花星。

“仙”是英文“CENT”的广东方言读音,即一圆银币的百分之一,原是英国在香港发行的铜辅币计值单位,这也正说明了中国铜元最早是仿造香港铜辅币铸造的(香港铜元又叫铜仙,始铸于1863年)。与此同时,广东还试铸了值半分的光绪元宝,但没有发行。

广东“每百枚换一圆”铜元发行之后不久,又遇到了新问题:人们不习惯“百枚换一圆”的换算方式,不少地方发行流通受阻。老百姓虽然乐意接受新式“铜仙”,但仍然把它与根深蒂固的“制钱”计算方

式直接挂钩,使用时按制钱方式进行计算,而币面面值则是与银圆换算的体系。在老百姓眼里,银两和制钱是平行的,二者并无所谓“主辅”关系,使用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弄清楚原委后,广东当局于1904年下令改变文字,把后来铸造的十文面值一律改为“每元当制钱十文”,背面英文面值改为“TEN CASH”,基本去掉了香港铜元的影响,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制钱制度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这一改变极大地促进了广东铜元的销售与流通,民间需求量之大是主持者始料不及的,利润之高也令主持者喜出望外。

很快,便利、精整的铜元就流通全国了。紧接广东之后,福建于1900年8月也开始铸造铜元,由闽浙总督奏准在福建官银局开始铸造。正面纪值文字一开始就采用了与制钱挂钩的“每枚当制钱十文”,流通广泛。福建之后是江苏,开铸“江南省”“江苏省”字样的铜元,时间是1901年4月,铸造精美,也很快流通全国各地。

铜元本质上也是一种贬值的大额货币,是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采取的货币手段。但铜元以其前所未有的形制、精良的外观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赖,最直接地解决了市面钱荒的燃眉之急,也为造币厂及政府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入。这在面临庚子赔款沉重压力的清政府眼里,无疑是一剂救世良方。于是1901年12月24日,户部终于发布皇帝上谕^①:

近来各省制钱缺少,不敷周转,前经福建、广东两省铸造铜元,轮廓精良,通行市肆,民间称便。近日江苏仿照办理,亦极便利,并可杜私铸私销之弊。著沿江沿海各省督抚筹款仿办,即就各该省搭铸通行。

安徽第一个响应,于1902年4月成立铜元局,6月试铸多种样币,有方孔十文、飞龙十文、宝皖五文等品种,数量稀少,属于试验性质。8、9月间才改版铸造大量坐龙类型五文、十文、二十文投入流通。

湖北开铸铜元时间比安徽早,1901年即已紧随广东、福建之后在湖北银圆局铸造十文铜元。但湖北铜元局却是1902年8月才成立的。湖

①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873页。中华书局,1964年。